

“1962年的右倾”：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理论分歧

谢昌余，丁岩松

(安徽省巢湖市委党校，安徽巢湖，238000)

摘要：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根源于当时他们的理论分歧：以调整国民经济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左”还是反右；允许、支持还是反对、制止农民群众搞包产到户；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还是维护、捍卫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关键词：“1962年的右倾”；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3-0040-07

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令与会的绝大多数人感到骇然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这张与刘少奇决裂的大字报中，“1962年的右倾”是毛泽东列出的刘少奇三大罪状中的第一大罪状。^{[1](90)}本文就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理论分歧。

1962年，面对陷入极度困境的中国经济，刘少奇依靠中央集体，集中集体的智慧，认真、冷静、客观、全面地分析经济形势，坚持将国民经济的调整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努力纠“左”，为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广大干部群众平反；允许和支持农民群众搞包产到户，谨慎地对三面红旗提出疑义。对此，毛泽东在当年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将其作为“右倾”加以严厉批判，这就是“1962年的右倾”的主要内容。

一、以调整国民经济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跃进失败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只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1962年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作出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正确判断上，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然而，在当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却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由此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讨论农业、粮食、商业以及国家支援农业等议题。面对毛泽东的尖

锐批评和指责，刘少奇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又担心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将会打乱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所以，在8月20日的中心小组会上，他提出建议：“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问题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2]“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2](916-917)}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被认为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会上，毛泽东再次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再次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甚至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9月26日，刘少奇再次检讨自己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太严重，承认“今年五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2](918)}但是，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刘少奇仍坚持说：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划个范围，“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来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3](369)}很明显，在刘少奇看来，经济工作是中心，不能受干扰和妨碍。

刘少奇两次郑重提出这个问题,其目的是要保住“中心”工作,尽管他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也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但他是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条件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国家生活实际上是一个“中心”(“第一位”)一个“纲”并存: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仍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另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所幸的是,政治上的错误指导思想还没有对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冲击,刘少奇所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基本上恢复正常。^{[3](377-378)}前后仅用4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就顺利完成。这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坚持经济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干扰和妨碍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以上这段工作经历,为党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宝贵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要“一天也不耽误”,^{[4](241)}要“横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要将经济建设工作“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4](249)}不仅如此,为排除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的干扰、妨碍和冲击,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发发展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之路。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5](117)}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将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5](373)}他还再次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5](370-371)}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广,前景越光明。

二、反“左”还是反右

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是什么?是此时刘少奇极为

关注,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深入湖南农村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在逐步摸清、掌握农村真实情况后,刘少奇排除“天灾”的说法,认为工作中的“错误”是产生困难的主要原因。由此,他还向乡亲们诚恳表示“承认错误”。^{[6](328-329)}不仅如此,刘少奇还认为,最主要的“错误”是“左”。

所以,1961年5月24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7](524)}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后,在同起草报告的陈伯达、吴冷西、胡绳等人的谈话时,刘少奇特地强调:“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不反‘左’只反右、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3](306)}为了引起全党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大胆地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宁左勿右”的思潮:“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劝告同志们,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6](427-428)}显然,在刘少奇看来,“左”和右同样都是方向性错误,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确,一者错误。

1962年3月17日,刘少奇在同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谈公安工作时,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道:“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你们要认真

检查,彻底揭露、批判。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当谢富治、王任重谈到这几年政法机关经常被批评为“右倾”的情况时,刘少奇又说:“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撤职。坚持真理,撤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7](551)}

反“左”势必要为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广大干部群众平反。为了推动当时已经开展的甄别平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8](396)}紧随之,在5月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了专门讲话。他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也比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刘少奇插话说: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对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8](396-397)}到1962年8月,全国得到甄别平反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总共达700多万人。^{[8](397)}

对于这次平反工作,毛泽东不同意一风吹,更不准给彭德怀等人平反。在1962年8月5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9](1238)}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9](1253)}很显然,毛泽东反对“平反风”首先是针对彭德怀,其次也是针对邓小平所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致使这一工作由此中断而没能完全彻底进行下去。他还针对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责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10](200)}上引史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坚持“左”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4](147)}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决策。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彭德怀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回顾彭德怀光辉的革命历程,为他恢复名誉。平反冤假错案是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指导思想的需要,是凝聚人心,创造和谐环境,激发和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性的需要。一句话,是全面纠“左”的需要。1992年,针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想的回潮,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375)}我们认为,邓小平这段关于“左”的危害性的分析,其中一定也含有他对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

三、允许、支持还是反对、制止农民群众搞包产到户

大跃进失败后,最困难的是农村。到1961年,农村很多地方已经面临断粮险境,加上劳动过度,很多农民已经患上浮肿病,有的因饥饿而死亡。如此严峻的形势推动着刘少奇思考恢复、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深入的湖南农村调查使刘少奇萌生出将小片土地包给农民的想法。1961年5月7日,在他自己的旧居同乡亲们谈话时,刘少奇说:“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可以包产到户。荒地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群众:包产到户要好些。)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6](330)}这里,刘少奇只赞成有限的“包产到户”,即小量的、不成大片的土地可以包给农民。这是笔者目前见到的最早支持农民群众搞包产到户的中共最高

领导层成员的表态。而且,他还相对地说出了几十年后广大农民中盛传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同时,刘少奇还提出:要包死,包死好。^{[3](347)}实际上就是说:要把包的地明确下来,长期不变,让农民安心生产。

七千人大会后,随着全党调查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的态度开始越来越明确。当田家英汇报说湖南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呼声极高时,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他还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为慎重起见,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刘少奇还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11](91)}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时再议。^[12]7月初,当陈云和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交换意见时,刘少奇说: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3](357)}同时,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田家英开始起草一个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3](357)}

对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严厉地指责刘少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13](288)}并提议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他还说,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14](1086)}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刘少奇只得跟着转变态度。1962年7月18日,在接见100多名司局长以上干部(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调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帮助工作)的讲话中,刘少奇批评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强调要巩固集体经济。他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你们到农村工作的、到地委和县委工作的同志,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6](461)}

然而,他的转变,并不彻底,而是非常谨慎地对“包产到户”问题存疑、“研究”。在讲到怎样巩固集体经济时,他又强调必须实行责任制。他说:“怎样巩固集体经济呢?……必须实行责任制。……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快,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

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现在分开打场有困难,不分开打场产量就难搞准确,只能找老农估计,大家评定。如何使产量跟责任制联系起来,这是要研究的。”^{[6](463)}在这里,刘少奇还是把必须实行责任制同巩固集体经济联系起来,从而表明了刘少奇对实行责任制以转变农村经济困难形势抱有坚定的信心。可见,至此,刘少奇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所以,即使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面前,他还是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一个余地和“尾巴”。

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9](1238)}他还从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批评包产到户。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3](362)}紧随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继续狠批“单干风”。至此,由农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营形式——“包产到户”,在毛泽东这里就被彻底扼杀了。

需要提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陈云认为分田到户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主张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这一主张还得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认同和支持。^{[15](1321-1322)}李富春也持赞同包产到户的态度,为此,他在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的信中反映了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生活好转的情况。^{[14](1081)}邓子恢先后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并根据考察结果明确主张搞联产计酬的包产到户。^{[14](1082)}他坚持认为,“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12]

考察以上史料,我们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为什么会为农民群众干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

争论,否定改革开放国策的思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邓小平在回击这股思潮的南方谈话中,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16]他还明确指出:“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5](371)}至此,以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

四、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还是维护、捍卫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广大干部群众对作为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三面红旗”已经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的态度。对此,中共高层领导不得不给予回答。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17](136)}

对“三面红旗”问题的阐述,刘少奇采取的是谨慎的说法。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他说: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17](136-137)}

至此,刘少奇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6](426)}

认真研读上引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刘少奇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他虽然从总体上肯定“三面红旗”,但又指出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他虽然要“继续为三面红旗

而奋斗”,但又说“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需要“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作出结论”。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心态说明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自己不同看法的。

值得一提的是,口头报告在谈到彭德怀问题时,刘少奇一方面用“小集团”、“阴谋篡党”、“里通外国”等罪名加在彭德怀头上不给予平反,另一方面他又说: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14](1091)}透过刘少奇的后段话,我们可否理解,刘少奇也认为当年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不是反党的。

如果说,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还处于谨慎状态中,那么,刘少奇在会后整理这份口头报告时,态度却显得非常鲜明。他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7](285)}

在“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没有让步。他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缺点错误只是发生在具体工作中。^{[18](458)}然而,数千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终究是客观事实,所以,毛泽东的内心虽然没有服输,但他已无法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出比较充分的正面阐述,更没有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时的那种理直气壮,也失去庐山会议期间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向全世界作战”的那种“气魄”。此时,他是多么希望党内高层领导能够站出来支持“三面红旗”。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满足了毛泽东的这一需要。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

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17](142-143)}

对待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当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9](1197)}3月20日,在林彪讲话整理稿上,毛泽东批示道:“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为此,他还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10](62)}笔者认为,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寓意是很深的,其中似乎隐含着对刘少奇口头报告的不满和批评。4月29日和30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罗瑞卿两次谈话时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19](302)}很显然,毛泽东很希望像罗瑞卿这样的高级干部在怎样看待三面红旗问题上能做到像林彪那样。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三面红旗造成的后果归结为:“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0](805-806)}邓小平也多次讲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是一场“大灾难”。^{[5](115, 136, 227, 234, 253)}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格格不入,所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和推广,人民公社自然越来越无法与之相适应,最后只有解体。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通知要求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工作。至此,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社会实践终于回答了当年刘少奇所说的“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话。1992年南巡途中,邓小平再次用农村改革的成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回击“左”倾思潮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质

疑和责难。^{[5](374)}

总之,面对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刘少奇能够依靠中央集体,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认真、冷静、客观、全面地分析经济形势,制定出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领导全国人民较快地走出经济困境,为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该说,刘少奇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上所作出的非常艰辛但又是较为成功的探索。它得到邓小平的重视,被邓小平承续而吸纳,并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

注释:

该文写于1966年8月5日。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1966年8月7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详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428页。

1962年6、7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的甄别试点工作,有的没有进行,有的刚开了个头,或者只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就停止了。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00—201页。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王稼祥的批示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91页。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传·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3] 鲁彤,冯来刚. 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8] 丛进. 曲折发展的岁月[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1] 董边,谭德山,曾自.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2] 项小米. 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J]. 炎黄春秋,2006(10):

- 1-10.
- [13] 黄峥. 王光美访谈录[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 [1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16] 杜明明, 徐庆全. 田纪云谈 1992 年中央党校讲话[J]. 炎黄春秋, 2009(3): 1-6.
- [17] 张素华.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19] 林蕴晖. 国史札记——事件篇[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Liu Shaoqi and Mao Zedong in judging the “1962’ Rightist Trend”

XIE Changyu, DING Yansong

(The Party’s School of Chaohu City, Chaohu 238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in judging the “1962’ Rightist Trend” Liu Shaoqi and Mao Zedong’s existed mainly in regarding adjus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or class struggle as the center; the fight against “Left” or rightist; to allow, support or oppose, forbade the farmers engaged in production contract households; to sum up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ree Red Banners” in practice constantly, or to maintain, defend an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four aspects of “Three Red Banners”.

Key Words: “1962’s the Rightist Trend”; Liu Shaoqi;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 socialist construction

[编辑: 颜关明]